

集論史關係韓中

著
譯

宗海
善全

[韓]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韓關係史論集

〔韓〕全海宗著 全善姬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关系史论集/ (韩) 全海宗著; 全善姬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

ISBN 7-5004-2082-X

I. 中… I. ①全… ②全…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
系史-韩国-文集 IV. D829.3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81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4

字数: 357 千字 印数: 1-1 200 册

定价: 25.00 元

韓國研究叢書

總 序

還是 1992 年 3 月，我應大宇財團金宇中會長和韓國社科院金俊燁理事長的邀請，首次出訪韓國。這個素稱“君子之國”、“禮儀之邦”的民族，讓人驚異于一種古典美與現代美的融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契合。

中國與韓國，都地處世界東方，都有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還都曾長久地使用過同一種文字，至今秉承着大體相仿的文化背景。正如欲尋覓西方文明的踪跡，就不能忽略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一樣，誰如欲探溯東方文明的淵源，就不能不了解韓國的古文化。中國與韓國，都曾有過輝煌的歷史。

正是基於對過去輝煌歷史的開掘和對未來光明前途的開拓，我們編輯出版這套“韓國研究叢書”。由本校相關係所的兼職研究人員為基本隊伍，發展同國內外韓國研究方面專家學者的合作研究。學術研究以傳統文化方面為重點，主要包括：韓國的歷史、文化與現狀；中、韓文化的比較與交流；東方文化。課題範圍涉及歷史、哲學、文學、語言、藝術、政治、宗教、經濟、教育、法律、新聞、旅遊等各個領域，其成果以論文集或專著形式相繼出版。在這里，我要特別感謝金宇中先生和金俊燁先生為共同弘揚源遠流長光輝燦爛的東方文明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不少有識之士預言：一個“太平洋時代”正在到來。日本的經濟領先，韓國的經濟騰飛，呼應着東北亞的是東南亞的經濟躍進，而中國，隨着經濟發展地深化引起了社會各個領域的重大變革，這一切既預示着嶄新的歷史機會，也昭示着嚴峻的時代挑戰，而“可能”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隙罅，只有憑血汗辛勞才能填補。儘管前路漫漫，然而畢竟世界文明中心的東移，已經在太平洋綿遠浩遼的東海岸激起了陣陣拍岸潮頭。

浙江的寧波古稱明州，曾是中國與韓國海上交通的大港。當時朝廷為高麗使節處理公務和食宿之便，特命創建“高麗使館”，至今遺址尚存。朝廷還派遣使臣在明州建造兩大神舟，一號“凌虛致遠”；一號“靈飛順濟”，都“巍如山岳，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出使高麗之時，“傾國聳觀”、“歡呼嘉嘆”，高麗國王也抱病出迎。隨着一度中斷的中韓關係的復交，這條歷史上的黃金航綫必將續接，我們也能從寧波港乘船東航，在萬頃碧波之外，迎迓旭日東升的壯景。

我企盼這一天的到來。是為序。

2080/02

沈嘉雄

序

金俊燁

(韓國社會科學院理事長)

全海宗教授多年學術研究的努力結晶，即《中韓關係史論集》不久將在中國出版發行，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

解放以後，我與全教授為了中國史的研究和發展共同努力約半個世紀時間。幾千年以來，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文化上中韓兩國關係連綿不斷。因此，我和全教授共感這一方面研究的意義非同一般。這也是我們共同創建東洋史學會的原因所在。而在韓國所謂東洋史主要指的就是中國史。

我和全教授的交情不止於學術方面。我們彼此之間私交甚篤，我始終敬仰着他的學問和人格世界。解放以後，我曾在《思想界》雜誌社擔任主編。這是一種在韓國文化界發揮非常重要作用的月刊雜誌。當時，需要登載中國史方面稿件時，我經常拜託全教授撰寫有關文章。他的文章能够啟發一般韓國人瞭解中國情況。我於1958年以訪問學者身分赴美國哈佛大學時正是全教授替代了我在高麗大學的中國史講課。出於以上原因，我非常樂意執筆草擬即將在中國出版的全教授頗具獨創性和開拓性的《中韓關係史論集》一書序文。

本書共收錄 19 篇論文。其中，關於全盤的導論和政治關係論文有 6 篇，關於朝貢關係及經濟關係論文有 7 篇，關於文化方面的論文有 6 篇。當然，朝貢關係同政治、文化相關。本書收集和翻譯了全教授早年在韓國國內發表過的論文中闡述韓中關係史根本性質及其真相的論文（在中國大陸和臺灣曾發表過全教授的部分論文）。過去，我也拜讀過全教授的論文，那時我已注意到全教授與眾不同的提出問題和治學方法。全教授從不單純地局限於追究有關中國和韓國具體交往的歷史事實方面，而是善於從宏觀角度出發研究問題。

如今，我看到在韓國已出版的分散收錄在《韓中關係史研究》一書和《東亞文化比較史研究》一書中的文章編成一本專著而行將出版的情況以後，不得不再次佩服全教授的提出問題和治學方法。全教授不僅從宏觀上劃定問題範圍，而且其研究方法獨樹一幟。他在考察和分析問題時，徹底探討和考證文獻，在這一過程中，他從未遺漏一言一句。據我所知，這是全教授平素頗關注清代考證學治學方法的緣故。而全教授這般的認真態度曾如實地反映在其論述《後漢書》、《三國志》及《魏略》和《東夷傳之文獻研究》一書之中。

在 19 篇論文中，可列舉清晰地反映全教授宏觀的、綜合的、分析的、批判的治史方法的文章如下：關於韓中關係史導論論文有《中國與外夷》、《中國與韓國》、《中國古代人的韓國觀》；關於朝貢關係的論文有《韓中朝貢關係概觀》、《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關於經濟關係論文有《中世紀韓中貿易形態初探》；關於文化關係論文有《試論東亞古代文化中心與周邊問題》、《中韓日三國古代文化比較淺議》及《論中國和韓國的實學》，等等。

全教授力圖真實地展現過去的歷史事實，於是試圖論述古代文化的中心及周邊問題。又，在考察朝貢關係的基礎上誠懇地承認中國古代文化和政治勢力的先進性。而恰恰這一點曾經觸及韓

國國內一部分學者的自尊心，並受到他們的批判。然而，全教授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要正視歷史事實，歪曲或模糊或美化都不是史學家所走的正道。

記得全教授曾經說過：在前一段時期韓中之間文化交流的中斷是件不幸的事，假如韓中關係早一些正常化，那末不僅韓中關係史研究必定更趨活躍，而且其研究必定已碩果累累。直到如今才向中國史學界介紹全教授的研究成果，這未免令人發出為時較晚之慨嘆，但仍不失為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此書出版當能增進韓中文化交流，從而為韓中友誼助一臂之力，這是全教授的殷切希望。同樣，這也是本人的期待。

最後，特向杭州大學為翻譯全教授著述在長時期內傾注全部心血的全善姬女士和為修改此譯文辛苦勞動的黃時鑒教授深表謝意。可以說，我為了韓國和中國的歷史研究傾注着畢生精力，尤其是從1988年以來我經常赴中國進行訪問，為了在中國的韓國學研究的發展盡最大努力。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相信通過學術研究的相互深刻瞭解才是增進兩國友誼的最基本紐帶。另外，我曾先後為在杭州大學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遼寧大學、山東大學等著名院校設立和發展韓國研究所盡心盡力。相信此次翻譯出版全教授著作會使杭州大學韓國研究所在韓中文化交流方面留下又一業績。

1996年5月18日

序

黃時鑒

韓國歷史學家全海宗教授《中韓關係史論集》的漢文譯本行將問世。他與金俊燁教授商量後，決定邀請我寫一篇序。按說我是不敢擔當此任的，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閱讀了此書全部漢文譯稿，而且為了修改譯稿，與全老進行過反覆討論，可能在中國我是對全老其人其學瞭解較多的後學同道，便決意允諾下來。

我想借這個機會先對全老作個簡單的介紹。全海宗先生，號于湖，1919年7月出生於中國延邊的間島。他從四歲起即接受祖父全在一先生的漢文教育。祖父與父親全盛鎬先生都曾在中國東北從事韓國獨立運動，因而愛國的意識自幼根植於心。青年時期他曾留學日本，適逢日本戰敗投降，他終於返回韓國，專攻史學，並成為祖國光復後史學勃興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3月，他是韓國歷史學會的創立發起人之一，1965年11月，他又是韓國東洋史學會的創立發起人之一，而且擔任“代表幹事”（相當於會長）。四十多年來，他在韓國史學界具有很大影響，而且日漸獲得國際聲譽。他從1976年起提任國際歷史學會議韓國委員會委員長，直到現在。1977年6月他又被選為韓國學術會會員（相當於院士），並連任至今。

當我從1992年起開始與全海宗教授相識時，他早已勳譽滿

身，但卻顯得十分質樸，平易近人。1992年1月，國家教委國際交流司與杭州大學在杭州舉辦“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是“中外文化交流”分組的召集人，他提供的論文題為《中韓日三國古代文化比較淺議》（今已收入本集），參加我們這個分組。沒想到這年8月中韓建交，第二年4月杭大韓國研究所成立，沈善洪校長委托我“兼管一下”，接着本所全善姬女士翻譯本《論集》，全老於1995年12月親自前來杭大商討譯事，又於1996年1月蒞臨杭州出席學術會議，我們之間的接觸相當頻繁。及至今年4、5月間我訪問韓國，與全老最後討論譯稿的總的問題和每篇文章的具體問題。交談越多，相知越深。我通過這種實際的學術交往，便對他的為人與治學有了一些貼切的瞭解。

我所瞭解的全老，可以用“質樸通達”四字進行概括。文如其人，他的學風文風是最質樸不過的了，沒有一絲文華之氣。記得我們交談譯事時，我提起嚴復提倡的“信、達、雅”，他說：“就我的論文而言，做到信、達我就滿意了，不需要雅了。”他一再叮囑漢譯者小全不要在遣字用詞時進行修飾。我讀他的文章，無論是綜合的、分析的，還是比較的，都感到他首先是切實地提出問題，然後憑借充分的資料，邏輯地進行論證。自己研究到什么程度，就如實地講到什么程度，透明坦誠。即使一些宏觀的立論，譬如論及文化的中心與邊緣問題，他結合論題提出頗為深刻的見解，但表達得通暢明白，沒有絲毫的賣弄做作。他所反覆說明和堅持的一些觀點，譬如歷史上韓國人的對外觀和中國文化對韓國的影響，雖然引起爭議和受到某些學者批評，但現在讀來依舊有其真實樸素的力量。還有他的一些比較分析，譬如論中韓王朝交替的不同、儒教文化的普通性與特殊性、朝鮮實學與清代學術以及中韓日古代史上“歸化”的含義等，往往從關鍵詞詞義着手，看來似乎簡單，但卻能從這個基點透過某些歷史的現象而切入討論的主題。全老頗擅長使用這種研究方法，於是形成了他的風格。

全老的“質樸通達”還表現在他真誠待人，從善如流。我不懂韓文，因而就全老的文章祇能從小全的漢文譯稿提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對於自己提出的問題沒有多大把握。但是，當我和全老進行討論時，不論問題大小，他都十分認真地傾聽和思考，最後，祇要他認為你說得對，他總是懇切接受。他研討學問時的言談舉止，一切都出自本心。真是敦厚長者的氣度，虛懷若谷，自然包容。今年晚春季節我初訪他府上時，他請夫人為我們兩人照相，不選別的鏡頭，就邀我站在他已打包的要贈送給杭大韓國研究所的那批藏書前攝影留念，顯得由衷的高興。我在他府上促膝修改譯稿，不由得想起了朝鮮王朝時代學者柳得恭的詩句：“海外豈無知己泪，沈香椅上手抄時。”我感到做這樣的文化交流工作真是心舒意暢。

現在，全老的這部論集的漢文譯稿行將問世。讀稿之餘，我產生一個想法，前不久與沈善洪學長、金健人教授談起，並得到他們的贊同：我們杭大韓國研究所宜以這部書為起點，有計劃地譯出一些韓國學界的重要論著。由於中韓兩國建交較晚和語言的隔閡，中國學者對韓國學界的研究成果迄今所知甚少，我們應該努力做一些工作來彌補這種令人遺憾的闕失。

1996年6月30日

原作者自序

全海宗

當初，我上大學時報考的專業是政治學。我選擇它並不是因為對此感到興趣，而是那時身處韓國深受外來勢力侵略的形勢之下，痛感當務之急是要弄清何為政治學。然而，僥倖的是不久便迎來了二戰結束和日本敗退的現實。於是，我感到再沒有必要繼續學習政治學，隨即決定改學歷史。在歷史學中，我首先關心的是自己國家的歷史，即韓國史。可是，如果要專攻韓國史則不無存在洞察歷史的視野變得短淺的顧慮。這樣，我決定研究與韓國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中國史。下此決心時正值 1946 年 1 月，迄今已有 50 年。另外，我的祖父和父親在中國東北地區從事韓國獨立運動和我本人又出生在延邊的事實，也促使我選擇這一條路。

大學畢業後，我在大學從事研究和講授中國史的同時發表過幾篇有關中國史方面的論文。但是，由於韓中兩國沒有建交，在幾乎不可能收集有關中國史基本資料和進行國際交流的情況下，我的中國史研究而臨着重重困難。不用說與中國間的交流，即使與日本進行交流，直到 60 年代也很難。雖然在韓國國內有一些最基本的中國史資料，但卻非常有限。為了打開這一困局，我進行多方的考慮，終於想出研究韓中關係史。在從事韓中關係史研究過程之中，我越來越領悟到這一領域不僅對研究韓國史是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而且從中國史角度來看亦占據着重要地位。

我認為在研究兩國關係史過程之中，一方面需要研究在歷史上的實際的交流或接觸，即具體地、分析地研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接觸，經濟上或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人員來往的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有必要從宏觀的、綜合的角度理解此種交流和接觸。而且還需要兩者同時進行。即使不屬於實際上的交流或接觸的具體歷史事實，對兩國各自存在的類似的歷史現象進行比較考察亦顯得非常重要。

本書共收錄 19 篇論文。其中有綜合論文 6 篇、分析論文 7 篇以及比較論文 6 篇。“導論”的兩篇、韓中朝貢關係的兩篇、文化中心與周邊的論文等屬於綜合研究；有關王朝交替、歸化、三國古代文化、儒教文化以及實學的論文屬於比較研究；其餘論文則屬於分析研究。兩篇“導論”雖然屬於短文，但是欲提示綜合的觀點。而朝貢關係是本人尤為關心的課題，它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文化、理念上都構成韓中關係的重要基礎。有關文化中心與周邊問題是本人為有助於理解東亞三國文化特徵而概括敘述的。有關漢代朝貢關係論文是為理解先行於韓中間朝貢制度的中國對外接觸概貌而論述的。屬於比較研究的文章則從韓中關係史角度出發針對突出問題進行論述。在 19 篇論文中，7 篇原收錄於韓國出版的《韓中關係史研究》一書；4 篇收錄於《東亞文化比較史研究》一書；4 篇收錄於《韓國和中國》一書；其餘 4 篇發表在各學術雜誌上。

韓中關係史研究的成果向來並不多見。因而，本人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向這一未開拓研究領域傾注了不少心血。祇是，回想起來我深感自己的研究成果猶如滄海一粟那樣仍顯得微不足道。儘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如今韓中之間的文化交流已得以實現。雖然難免有一些為時較晚之感，但是能看到在中國刊行這一本論集，這對本人來說無疑是非常值得慶幸的。

在此，我謹向為出版本書辛勤工作的各位學者致意。首先，向杭州大學校長兼韓國研究所所長沈善洪教授、同研究所黃時鑒副所長、研究員全善姬女士以及為此書出版而努力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教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教授深表感謝。同時，向摯友金俊燁表示謝意。我通過金俊燁教授的介紹，曾於1992年1月參加在杭州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那時我向杭州大學贈送了《韓中關係史研究》一書。次年，同校建立韓國研究所，全善姬女士提議翻譯此書，承蒙該所領導支持並通過金俊燁先生向我本人轉達此意。全女士傾注兩年心血翻譯了此書。蒙元史和中外關係史大家黃時鑒教授不僅徹底審閱了本文譯稿，而且在有關蒙元史方面提出難能可貴的助言。李學勤教授儘管初次見面，欣然接受本人的請求並向王俊義教授推薦出版本書。王教授很快允諾並來函示知。在此書出版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在韓國致力中國史研究和發展的金俊燁教授的幫助。金教授和黃教授的序文為此書倍增光彩。對此，我謹再次表示感謝。如果沒有以上諸位的熱忱幫助，就不可能有本書問世。研究學問的人，尤其是研究特殊問題的人難免沉浸於某種孤獨感之中，這恐怕不僅是本書作者的感受。然而，祇要他們體會到必有親鄰、必有知己的現實時，其心靈深處也會倍感慰藉。再次感謝杭州大學韓國研究所諸位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諸位先生以及李學勤教授和金俊燁教授。最後，借此機會特向多年為本人研究給予默默奉獻的妻子表示衷心謝意。

希望本書出版為韓中關係史研究的發展盡綿薄之力。假如以此為契機，能使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並進而對韓中文化交流的發展添一份貢獻，本人將感到莫大榮幸。

1996年6月於韓國

目 錄

序(金俊燁)	(1)
序(黃時鑒)	(4)
原作者自序(全海宗)	(7)
韓中關係史導論之一——中國與外夷	(1)
韓中關係史導論之二——中國與韓國	(8)
古代中國人的韓國觀	(23)
歷史上韓國人的對外觀	(64)
中國與韓國的王朝交替初探	(74)
試論東洋古代史上“歸化”的意義	(93)
漢代朝貢制度考	(118)
韓中朝貢關係概觀	(130)
有關丁卯胡亂的和平交涉與朝清朝貢關係的開始	(164)
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	(181)
中世紀韓中貿易形態初探	(243)
論麗宋交流	(250)
論麗元貿易性質	(283)
試論東亞古代文化中心與周邊問題	(294)
中韓日三國古代文化比較淺議	(310)
儒教文化普遍性與特殊性略述	(335)

論中國和韓國的實學之一——釋實學·····	(347)
論中國和韓國的實學之二——朝鮮時期實學論 比較窺議·····	(367)
清代學術與阮堂金正喜·····	(385)
譯者後記(全善姬)·····	(443)

中國與外夷

——圍繞關禁和海禁

觀察歷史上中國與韓國的關係(一般指中國與外夷的關係),可以發現不同時代存在着不同的差異及特徵。在歷經兩千年的韓中關係中,這些差異不僅呈現多種形態,而且每個時期都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如果要詳細考察其差異和特徵,有必要廣泛收集史料並對之進行仔細的分析。在本文裏,筆者擬舉特定時期的特定現象,探討從唐朝至明清時期中國與外夷,尤其是與韓國間的物資交流及人員來往的情況。本文不追究具體的歷史現象,僅僅以律令為中心,考察其普遍的歷史特點。

在唐代,政府限制物資交流,但在人員的來往問題上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唐朝基本上沿襲了南北朝以及隋代制度。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布的律令同隋朝律令相比,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仍是大同小異。眾所周知,在隋朝的律令中可以找出唐朝律令之原型。

在唐代,中國東部沿岸散居着新羅人;當時張保臯控制着中、日、韓三國的海上交通;從三國末期至統一新羅期間,大量有關儒教、佛教以及道教的書籍傳到韓國,兩國學者間交流異常活躍。這些事實都能證明,當時韓中之間物資及人員的交流比較開放。而這種情形可追溯到唐代之前。